

时间并不能淡化一切。事实上，一个曾经占据过你生活的人不是别的，他是你的蓝天，你的阳光，你的空气。一旦失去，没有什么可以取代，可以弥补。他将覆盖着你的生命，直到永远……

丁东◎主编
中国工人出版社

此生无悔

逝者

捷珊琛述丹柴方安娜一哉英波霞健迭郁敏达桐虹德容可之诚
闻萧章杨赵钟蓝郑胡周郦王小新凤戴乃克马任王赵李蔡沈张龚梁

悼者

英金功宜英芳沙代伟晓银河光茵益和芳均凤云璞普化礼晶
戴厚巴启韦君宗张狄冯亦胡徐李吴苑杨宪章贾任金胡宗李王孙方

二十四曲有情人的生命挽歌

此生此情

丁东◎主编

◎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此生此情：二十四曲有情人的生命挽歌/丁东主编.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5

(背影书系)

ISBN 978 - 7 - 5008 - 4969 - 8

I. ①此… II. ①丁… III. ①文化—名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4239 号

出版发行：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100120

发行热线：(010)62005049 62005042

网 址：<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250 千字

印 张：21.00

定 价：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 丁 东

《追忆双亲》付印以后，中国工人出版社又约我编选出这本以回忆逝世的丈夫或妻子为主题的散文集。在大量阅读中，我才发现，追忆伴侣的文章比追忆双亲的文章，在数量上要少得多。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当今国人较多地重视父母和子女的情分，而忽视了夫妻的情分吗？原因似乎不在这里。在中国古代的宗法秩序里，父子关系曾经长期处于比配偶关系更加重要和优先的地位，但一个世纪以来，西风东渐，夫妻关系在中国的家庭结构中得到极大的提升，早已处于核心的地位。我想，造成追忆伴侣的文章较少的原因，主要是年龄。百年修得同船渡。在通常情况下，夫妻年龄相近，往往一方辞世，另一方也到了生命的黄昏，有没有精力写作便成为问题。不少未亡人并非不想为先去的配偶献上一篇祭文，但已经力不从心。而中年丧失配偶的情况，毕竟只是少数。所以，一般的文章高手在写作盛年，很少遇到需要追忆配偶的情况。而父母去世，身为子女者尚在盛年，则是人间常态。因而追忆父母的文章自然

比追忆夫妻的文章多出许多。

这就大大增加了本书编选的难度。尽管如此，我仍然希望能够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力，选出一集能够直抵灵魂的文字。这些文章，有对忠诚的回味，有对坚贞的礼赞，有的回肠荡气，感人肺腑，有的娓娓道来，让人会心。被回忆的逝者有硕学鸿儒、艺坛巨匠，也有家庭主妇，百姓平民。我想力求避免雷同，尽可能多方面地展示半个多世纪以来家庭、婚姻、爱情的演变轨迹，让这些夫妻讲述的喜怒哀乐的生活史，折射我们民族的命运史和精神史。因为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我们这个民族经历了太多的风云变幻，使得许多家庭不得不承受疾风暴雨的严峻考验。

除了夫妻之间的回忆文章，本书还选入了一曲有情人未成眷属的爱情挽歌。这就是戴厚英的《闻捷之死》。诗人闻捷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吐鲁番情歌》闻名于世，不知唤起过多少人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何曾想十几年之后，自己为了追求美好的爱情，付出生命的代价却不能如愿？从古到今，有婚姻由父母包办而不能自主的悲剧，也有子女为私利干涉父母再婚的悲剧，但像戴厚英和闻捷这样真诚相爱，得到双方女儿支持，却被政治强权生生扼杀的爱情悲剧，却是那个荒唐的年代特有的现象。这恐怕是后人难以想象的。

哲人说，六经皆史。这些追忆有情人的散文，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二〇一一年三月

目录

1 序 ○ 丁 东

闻捷 诗人，1923年6月12日生于江苏省丹徒县，1971年1月13日逝世于上海

1 闻捷之死 ○ 戴厚英

萧珊 编辑家，1917年生于浙江鄞县，1972年逝世于上海

29 怀念萧珊 ○ 巴 金

章宝琛 家庭主妇，1910年生，1975年逝世于北京

41 老伴之死 ○ 启 功

杨述 政治活动家，1913年生于江苏淮安，1980年逝世于北京

49 当代人的悲剧 ○ 韦君宜

赵丹 表演艺术家，1915年6月27日生于江苏扬州，1980年10月10日逝世于北京

64 忆赵丹 ○ 黄宗英

钟惦棐 电影理论家，1919年10月生于重庆江津，1987年3月20日逝世于北京

70 永远的思念 ○ 张子芳

蓝田方 石油冶炼专家，1927年4月8日生于湖北武昌，1987年9月18日逝世于英国伦敦

82 难以消失的记忆 ○ 狄 沙

郑安娜 翻译家，1913年农历正月初一出生，1991年1月7日逝世于北京

86 **她就是她** ◎ 冯亦代

胡一哉 纺织工业专家，1911年5月生于湖北武昌，1992年8月18日逝世于北京

116 **情深意笃六十年** ◎ 胡绩伟

周郅英 民间知识分子，生于1946年4月27日，1994年5月5日逝世于北京

129 **永远的五月** ◎ 徐 晓

王小波 作家，1952年5月13日生于北京，1997年4月11日逝世于北京

153 **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家** ◎ 李银河

158 附：王小波的人生选择

新凤霞 表演艺术家，1927年生于天津，1998年4月12日逝世于江苏常州

168 **“回首往事”** ◎ 吴祖光

叶君健 翻译家，1914年12月7日出生于湖北红安，1999年1月5日逝世于北京

188 **最后的时光** ◎ 苑 茵

戴乃迭 翻译家，1919年生于北京，1999年11月18日逝世于北京

206 **此情可待成追忆** ◎ 杨宪益

212 附：半瓶浊酒 四年星斗

马克郁 俗文学研究家，1931年4月生于河北省大城县，2001年5月逝世于北京

222 **我和我的先生** ◎ 章怡和

任敏 教师，1918年生于山西汾阳，2002年11月20日逝世于上海

226 **在那个凄风苦雨的日子里** ◎ 贾植芳

228 附：做知识分子的老婆

王一达 戏剧艺术家，1919年生于湖北，2003年6月7日逝世于北京

237 **一达生病** ◎ 任 均

赵宝桐 空军飞行员，1928年生于辽宁抚顺，2003年12月12日逝世于北京

250 **送爱人宝桐远航** ○金 凤

255 附：风雨同行伴终身

李虹 编辑，1953年9月21日生于青海大通，2004年12月2日逝世于湖北武汉

277 **想爱你到老** ○胡发云

蔡仲德 音乐史家、思想史家，1937年2月26日生于浙江绍兴，2004年2月13日逝世于北京

289 **怎得长相依聚** ○宗 璞

沈容 记者、导演，1922年6月28日生于江苏省苏州市，2004年12月15日逝世于北京

294 **《红色记忆》二三事** ○李 普

张可 戏剧理论家，1919年生于江苏苏州，2006年8月6日逝世于上海

309 **送别张可** ○王元化

311 附：王元化追忆张可

龚育之 政治理论家、历史学家，1929年12月26日生于湖南湘潭，2007年6月12日逝世于北京

319 **你是我心中的盐** ○孙小礼

梁从诫 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1931年8月4日生于北京，2010年10月28日逝世于北京

324 **忆从诫** ○方 晶

闻捷 诗人，1923年6月12日生于江苏省丹徒县，1971年1月13日逝世于上海

闻捷之死

◎ 戴厚英 作家

我与闻捷的相识

大概是1964年吧，有一天我在马路上碰到一位熟悉的长辈作家，他身边站着一位高大英俊的中年汉子。那位熟人给我们作了介绍，说他是闻捷，刚调到上海的著名诗人；介绍我说这是小戴，非常活跃的青年评论家。我和闻捷就这样认识了。但是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交往的机会。闻捷先是到故乡丹徒去深入生活，然后又被调到上海京剧院，去写“样板戏”《海港》。我则忙着写文章，然后又是下乡参加“四清工作队”。

这次见面，闻捷没给我留下什么深刻印象，只觉得他对我这样的后辈（他大我十五岁）很慈祥、随和。但是，对闻捷这个人，我不能说毫无了解。我读过他写的《吐鲁番情歌》，十分欣赏。同时，上海作协也有一些关于他从北京调到上海的传说，说他感情开朗奔放，喜欢

胡言乱语，不能见容于北京文艺界的某些上级。但是在我们相爱以后他对我说，他南来的真实原因是躲避政治，他对政治感到厌倦和恐惧。

这一切由来有自。

闻捷，1923年生于丹徒县一个铁路小站站长的家里。父亲早亡，由母亲抚养他到十五岁。家道贫苦，他十四岁便去一家煤球店当了学徒。1938年，也是我出生的那一年，闻捷投身于抗日救国运动，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战宣传队，并参加了共产党。但是一切不幸都由1939年开始了。那还是“国共合作”的时候，闻捷所在宣传队党组织受到破坏，他们十来个人一起被李宗仁战区的国民党逮捕。根据共产党当时的战略和上级的指示，闻捷和他的战友们写了一份集体“悔过书”。“悔过书”没有承认共产党员的身份，只承认“年幼无知，误读不良书籍，误与不良人为伍”。“悔过书”保证今后“在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领导下，精诚团结，抗战救国”。这之后，闻捷在狱中党组织的指导下，哭着闹着要回家“找妈妈”，“继续读书”。国民党相信了这个十六岁的孩子，就把他放了。

闻捷出狱之后，在多方帮助下，辗转到了延安。他以为回到了自己的家，不料不久就开始了延安整风运动。他那段牢狱生活使他成了怀疑对象，要他交代是不是“国民党的特务”。他吓得乱说了一通，过了关，但从此丢掉党籍。

不再是党员的闻捷依然热爱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以战地新闻记者的身份投入了三年“解放战争”，1948年，因为他的勇敢和勤奋，又被重新吸收为中共党员。但是那以后，政治运动就始终跟着他。而且查来查去，都是要查清他十六岁时的那一段牢狱生活。解放初期的“审干”，把他那段历史重审了一遍，未发现他有任何隐瞒，却给他下了个结论，说他那是“变节行为”。这使闻捷灰心。他觉得自己的政治前途充满荆棘，便转行投入文艺。他以奇异清新的情歌一炮打响，离开了新华社，进入作家的行列。可是文艺界也不太平，他巧妙地躲过了反右斗争，却躲不掉又一次的“政审”。于是他想离开政治中心北京，回到

自己的故土南方……

可是到哪里能躲掉政治运动和审查啊？十六岁的那段经历，像一把随时可以下落的刀剑，杀他剐他都有依据。好像中国有一个可以任意解释的“二十二条军规”，只要能管住士兵，怎么解释都对。

我们相知，在动荡的年代

文革开始的时候，闻捷在上海京剧院参与领导运动。但是不到一个月，他和其他两位领导运动的人一起成了运动的打击对象。为了躲避武斗，他们在一些同事的帮助下躲了起来，一躲就是四十多天，成为上海滩上轰动一时的“言（行）、章（力挥）、闻（捷）事件”。当时马路上时常看到京剧院贴出的要捉拿他们“归案”的大标语。

1968年3月，闻捷被张春桥“勒令”离开京剧院回上海作家协会接受审查，并点明要重审他的“历史问题”。那时我正住在作家协会院内，并且刚刚担任“文革领导小组”的“第四把手”。闻捷的历史问题由当时作协的“专案组”统一审查，他在运动之初“外逃事件”的审查则交给了我和青年诗人王宁宇等三四个人。我为这几个人的组长。这大概就是说我是闻捷的所谓“专案组长”的来由。其实，“专案组”成员在当时都经过严格政审，一要党员，二要背景和历史清白，我和王都不符合这样的条件，因此都不是“专案组”成员。我们是“群众办案”组成员。

因为闻捷在“样板戏”剧组呆过，样板戏又是绝对不可涉及的禁区，所以当时作协领导小组决定对闻捷“保护性”隔离，叫他住到作家协会，以免被人从他那里挖去不利“样板剧组”的“防扩散”材料，那样他和作协都吃罪不起。

于是闻捷住到了我隔壁一间空房子里，我们有了朝夕见面的机会。但是我们从不随便交谈，没有第三个人在场，我是从来不与他搭腔的。这是当时的规矩。我时常和王宁宇一起和他谈话，叫他交代他“外逃”

的几十天干了什么，因而对他有了一些了解。

闻捷是这样的人，他襟怀坦白，对任何人都不存戒备。他把我和王宁宇当做朋友和弟、妹，每一次都侃侃而谈，不但“交代”了他在“外逃”的几十天里干了什么，还不时地谈论他的过去。他一谈起来就忘乎所以，完全忘记了我们的不同身份，“小王”“小戴”地叫个不停。我和王宁宇受他的感染和吸引，有时也会忘乎所以，与他扯些别的事情。这样，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未曾像别的审查者被审查者那样紧张。我常和一些朋友说，闻捷这个人真浪漫，他说他从京剧院逃出的那些日子想到处流浪，做个“行吟诗人”呢。朋友们对他的诗人品格也都付之一笑。

这一次闻捷在作协没住多久，上头就指示将他隔离到上海少教所去。因为外面来找他外调的太多，怕出问题。这时我们对他的“外逃事件”审查已告结束，未发现任何超出他个人交代的问题，剩下的只有对他的“历史问题”的审查了。这不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但是，有时外面来人找闻捷“外调”，或者有别的事情要找闻捷，有关领导还会要我和王宁宇去陪同外调或与闻捷谈话。因此，我仍然有机会见到闻捷。我们见面的次数极少，每一次都有别人在场，根本没有个别交谈的机会，更不可能产生什么“私情”。但不可否认，我对闻捷的同情和了解与日俱增。

转折关键是闻捷的妻子杜方梅的自杀。杜方梅我只见过一面，是向她了解闻捷的“外逃”情况见到她的。她的美丽、端庄和倔强，都给我留下极好的印象。突然之间她跳楼自杀了，使我很难理解。当时领导小组叫我和王宁宇去“少教所”找闻捷，把消息告诉他，并劝他“正确对待”。我们该怎么对他说明事件的真相呢？为了弄明杜方梅死之真相，我和王宁宇找到杜所在的上海市人民银行的造反派。我们说，不明真相，我们不好向闻捷交代。可是银行的人对我们不肯说实话，听来听去，我们还是不明白。只能说是“畏罪自杀”了。回来后我向作协领导汇报，并写了一个书面情况，要求将杜的死因查明。那位领导是一位工人作家，他看了我写的东西，叹了一口气，他说：小戴，你别自找麻烦

了。这种事谁给你查清？我想当时我们还背着“四·一二”炮打张春桥的罪名，等待清算，他的谨慎可以理解，只好作罢。

那天我是怀着同情与王宁宇一起找闻捷谈话的。当我们把杜方梅的事情讲完的时候，闻捷捂住了脸。泪水顺着他的手指缝渗出来，我看见他的下巴在剧烈颤动。我无法抑制自己的同情，便与王宁宇一次又一次劝他“相信群众相信党”，“正确对待”这件事情。离开闻捷的时候，我突然感到害怕，害怕闻捷想不通也走上绝路。我忍不住回过头来大声地说：闻捷，你不能死啊！你要活下去。我想闻捷是能够感受到我此刻的同情的。

杜方梅死后不久，闻捷的两个大女儿要到黑龙江插队落户。她们的一位女老师找到我，说她很可怜两个孩子，想问问闻捷到底是什么问题，可不可以给她们一个好些的鉴定，并且让她们在走之前见见父亲。我未加思索就告诉那位老师，说闻捷一定是“人民内部问题”，当然应该让他见见孩子。之后，我向领导汇报，请求给他们父女一个见面的机会。领导立即表示同意。

又是我和王宁宇一起，陪着闻捷的二女儿果子去“少教所”向闻捷告别。果子那年也正好是十六岁。多日不见，闻捷已见苍老。看着他们父女强忍泪水谈话的样子，我心里非常难受。我也想哭。闻捷鼓励着孩子，叫她们放心地去。他一点一点问着她们的准备工作，对女儿说，家中的一切，只要她们需要都可以拿去。女儿说：不要，我们什么都不要。

这次会见使我感到刺激。我回到机关把自己的心情对一些人说了，想不到这成为以后迫害我们的依据。

但是，到这时为止，还只是我在了解闻捷，闻捷对我并没有多少理解。他真正了解我，是我在“一打三反”中受审查的时候。

我接受审查时，闻捷也解除了隔离和我们一起下到五七干校。那时我们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他是可以放松一点的“死老虎”，我则变成必须狠狠打击的“活老虎”了。因为人手不够，“死老虎”常常被用来做

些打“活老虎”的辅助工作。如抄大字报、写标语横幅、布置会场之类。真是命运的安排，闻捷被命令书写并悬挂声讨我的横幅、标语。也许还有前一段时间有所接触的缘故，他关心起我的事情来。不论是人家揭发我的大字报，还是我的自我辩护的大字报，他都仔细读过。他说他的结论是：这个年轻的女同志是很不一般的。他喜欢我烈火般的性格。这时，我们才算彼此相知了。但是没有恋爱，也不可能恋爱。我还在维护着自己的婚姻，而且受着审查，他也还没有“解放”。我们只是互相了解了。

我们相爱，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

不久之后，闻捷“解放”了，作为问题的，还是十六岁时的那段历史。没有发现任何新材料，结论却比先前的审查结论要严厉，他被定为“变节分子”。工军宣队让他到养猪场养猪，他很努力，好像还养出点名堂来，因此受到表扬，还叫他到干校广播台去讲自己怎么“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养猪的。天晓得他当时讲了些什么。反正当时大家都那样讲，无论干什么事情，成功总是因为贯彻了毛泽东思想；失败，则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结果。这次“讲用”宣告他真正回到“革命群众”队伍中来了，从此他回到“连队”，和上海作协的人一起劳动。他回到“连队”以后不久，对我的审查也告一段落。于是我和他取得了相同的身份和地位，成为一个“战线”上共同劳动的“战友”了。我们在干校种菜。为了安排每天的劳动生产，工军宣队叫我负责安排“女劳力”，叫他安排“男劳力”，还命令对种菜略有经验的老作家丰村协助我们工作。

于是我们真正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对种菜都一窍不通，每天都得去附近生产队找一位老队长请教，以便决定明天我们该干什么。从干校到生产队有六七里路，我们每天晚饭后都必须在那条小路上来回走一趟。因为小路难走，每一趟都要花费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左右。但是我们不以此为苦为累，因为我们找到了谈话的机

会。现在不用再怕有人检举汇报，只有我们二人，什么不能说？总是他先询问我，离婚以后的日子如何？有没有再婚的打算啊？然后是我询问他，在黑龙江的两个女儿可好？小女儿在家由谁照顾？除了生活，我们便谈诗，谈文学。原来我们在文学上有许多共同的爱好。

我们的路越走越短，消耗的时间却越来越长了。我们常常不愿意结束谈话，很快回到干校。

那一天，风是风，雨是雨，还响着雷。我们照常到生产队去请教工作。小路又窄又滑，他不时地伸出手来搀扶我。到了老队长家，正碰上他家添了孙子，在吃圆子庆贺。老队长不顾我们的身份，一定要我们一人吃一碗糯米汤圆。我不敢吃，闻捷批评了我。他说你这个人就这么死板？吃一碗圆子有什么问题？这使我想起刚下乡劳动的时候，工宣队不允许我们在镇上买东西吃，他偏要吃。一天他去镇上拉粪，饿了，买了两个大饼吞进肚里。同去的“牛鬼蛇神”不敢吃，回来就揭发了闻捷。闻捷便在会上做了个叫人喷饭的“检讨”：工宣队不让吃大饼，他吃了，就是反对工宣队。工宣队代表党和毛主席，因此吃大饼就是对党反对毛主席。于是我笑着顺从了他，坐下来吃起圆子来。他胃口极好，不一会儿把一碗圆子吃完了。我却吃不下去。他看见我用筷子夹着圆子为难的样子，马上接过我手里的碗，把我吃剩的圆子三口两口吞完了，抹嘴笑笑，孩子似的。他是那么自然和随意，使我感到我与他已经不是一般的关系了。

回来的路上，我心里由不得激动而紧张。因为我还没有想到过会与他建立什么特殊的关系。他“解放”以后，不少有家和没家的女士都盯着他，对他关照有加。有人给他偷偷送水果，放在他床上；又有人整天对他絮絮叨叨，倾诉自己的孤独和苦恼。文艺单位的人，长期过夫妻分居的“集体生活”，这种情愫不难理解。这些事大家心里明白，都说闻捷交上“桃花运”了。这些事也成为我们路上谈话的内容，我常常取笑他，说某某很好，就娶了她吧。他总是很认真地说：小戴，怎么你也取笑我？你真的什么都没想过？

我真的什么都没想到，因为他比我大得太多，也因为杜方梅太美了。我只是觉得跟他在一起安全而愉快，因此依恋着他。可是今晚，我想到了他希望我想的事情。我心里十分害怕，这可能吗？我和他？

我一路上远远地避着他。但我还是不断地滑到水田里，他扶起我，我就把他的手摆脱了。我得好好想想啊！可是雨越来越大，我全身湿透，冷得发抖。他一次又一次叫我：小戴，靠近我，我护着你。我一次又一次固执地回答：不。可是，在走出小路，上了大路的时候，我听到一个颤抖的声音：小戴，靠近我！我再也抵御不住他的巨大的吸引，投入了他的怀抱。依靠在他宽厚的肩膀上，我哭了。我说我心里好苦。他说从今以后你就不苦了，有我……

但是回到宿舍，我又犹豫了，突然觉得我需要对了他了解得更多。第一次的婚姻失败使我不敢再轻易相信一个男人了。所以，第二天，当他邀请我这次休假到他家里去玩的时候，我拒绝了。我说：请把你写过的作品都给我看看，我要更多地了解你。他有些失望，但还是答应了。

我们定情在 1970 年的 10 月之初

在干校劳动的时候，我们是没有“星期天”的，而是每个月将几个星期天集中起来，回上海与家人团聚。那一次，我们休假在国庆节前夕。在机关组织观看电影的时候，闻捷让他的小女儿将一大包书交给了我，包里都是他的作品。

我抱着那包书回到家里，马上开始了阅读。我整整读了两天，一页不漏地把那包书读完了。我难以描述当时的心情。我被他的热情和才华震撼。我特别喜欢他那些清丽、热烈、执著的情歌，觉得字字句句是他对我发出的呼唤。于是，10月2日下午，我把那些书仍然用报纸包起来，敲响了他家的门（以后工军宣队叫我交代他对我的“腐蚀”，我为了说明我们是真诚的相爱，叙述了这种感觉。他们说：这就是腐蚀啊！你还为之哭泣！）。

啊，闻捷料定了我今天会来，他一天不出门，坐在家里等着我！

眼前的这个闻捷再也不是于校里的那个邋遢鬼了。他穿上当年到阿尔及利亚访问时制作的蟹青色西装，显得挺拔俊俏、神采飞扬。我一进门他就迎上来，说：我知道你会来，你一定会来。我想说什么，他又说，你先不要说，什么也不要说，你只回答我，是不是定了？我说：定了。他抱着我转了好多圈。然后，他坐下来，与我讨论起我们今后的生活。他说他不像人们想象的诗人，会滥用心。他找爱人都是凭感觉，但他是个忠诚的爱人。他说当年他对杜方梅就是一见钟情。但是一旦爱上了他决不放弃。他对朋友说：我一定要娶杜方梅为妻，否则将我巫之禄（闻捷的原名）三个字倒写。杜方梅果然成了他的妻。他说，自打他发现自己爱上了我，也在心里这样发誓：不能娶小戴为妻，我就把闻捷二字颠倒过来。

我无法表述当时所感到的幸福。这种幸福的感觉以前没有过，以后也没有过。他像大海一样把我完全包容在自己的胸怀里，我闭着眼睛在海面上悠悠荡荡，承受海水的浸润、爱抚。我的情感突然变得奔放而成熟。我觉得他对我的爱是那么完美，似父兄，又是情人。他说他感谢我的前夫，因为是他的遗弃使我趋向成熟。

我们的性格太相似了。都是热情有余而冷静不足。10月2日晚上，他还对我谆谆告诫：现在不是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因此我们的事要保密，对谁也不说。可是第二天，他就说：不，我们不能等待。我们要赶快结婚。我要把四个女儿（他三个，我一个）都接到身边来，我们一定能相处得很好。只是，我一个男人对你们母女五个，阴气太重，阴气太重。他高兴得哈哈大笑。

于是，我们商量起结婚的事。我们得写一份结婚申请交给工军宣队，没有他们的批准，我们不能结婚，这一点我们十分明白。此外，我们要通告亲友，征得他们的支持和同意。

我们给自己的亲友发出一封封信，宣告我们相爱了，我们就要结婚了。同时，我们一起商量写了一份申请结婚的报告。我们共同写什么